

罗兰·巴特与学院派

陈凌娟

【摘要】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正值时代变革，各种思潮纷纷涌现，学术界的论战声也此起彼伏。1964年，由罗兰·巴特为首的新批评和以皮卡尔为代表的学院派围绕作品的意义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这场论战在当时的法国学术界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巴特作为新批评的代言人引领起了一股文学批评的新浪潮。

【关键词】巴特 皮卡尔 新批评 学院派 符号学 实证主义

Résumé : Les années 60 ont été une époque de changements. De nouveaux courants de pensée sont apparus en France qui ont amené des discussions et des débats dans les milieux académiques. En 1964 une polémique a eu lieu autour de la signific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et qui opposait la nouvelle critique et la critique universitaire, respectivement représentées par Roland Barthes et Raymond Picard. Mais en fait, c'était la guerre entre la sémiologie et le positivisme. Ce débat avait une grande influence sur la critique littéraire, et Barthes a alors soulevé une nouvelle vague critique.

任何理论的发展总会伴随着不同的声音，而理论也正是在一次次的争辩中获取了前进的动力。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正值时代变革，各种思潮纷纷涌现，学术界的论战声也此起彼伏。

“大学是从不回应抨击的，但是，大家可以理解一位大学教员以个人名义对一些抨击做出反应，尽管这些抨击是缺乏影响甚至是不恰当的，但在一次次被重复后它们会变得危险。”^①这是摘自于1964年3月16日刊登在《世界报》上的一篇评论，作者是当时索邦大学的教授雷蒙·皮卡尔。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使这位在法国文学批评领域享有盛誉的教授如此恼火，又是什么样的抨击使他不得不以个人名义撰文回击呢？

1963年罗兰·巴特分别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和美国《现代语言评论》杂志上发表了几篇当代文学批评的文章，次年，这些文章被收录于巴特的《批评文集》。这令学院派大为光火，所以皮卡尔立刻在《世界报》上发表评论来回应巴特对学院派的指责。皮卡尔尤其针对的是一篇名为《两种批评》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巴特指出，当时在法国存在着两种批评，一种是学院派，它主要采取的是从朗松继承下来的实证主义，而这种批评常给人以毫无生气的感觉；另一种批评是解释性批评，它形式多样，代表各不相同，如心理分析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和现象学批评等等。正是由于巴特对学院派的批评引发了这场以巴特为代表的新批评和以皮卡尔为首的学院派的论战。

自19世纪后期以来，法国大学中的人文学科一直深受圣·伯夫传记式批评和泰纳的实

^① Raymond Picard, “M. Barthe et ‘la critique universitaire’”, *Le Monde*, le 16 mars, 1964.

证主义影响。学院派认为文学作品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复现，批评应该具有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是以大量的历史依据为基础的，因此他们总是给予作品之外的东西以过多的关注，试图透过作品找到作者。在《世界报》的这篇评论中，皮卡尔并未正面回应巴特的指责，而只是一再地维护学院派的正统性，他指出巴特对学院派的否定也就是对法国大学的传统及所有大学教员的否定。虽然他也赞成巴特关于科学建立文学事实的观点，但他又同时声称彼此的方法和特质是完全不同的。他否认自己的批评是一种传记式的批评，认为所谓的“新批评”不过是不停地重复一些名词，是毫无意义的。此外，皮卡尔还怒斥道：“抨击大学是先锋派因循守旧的一部分，而巴特先生正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①不难看出，在这篇文章中，从头至尾都充斥着皮卡尔对巴特的愤慨之情，他认为巴特对学院派的抨击是“轻浮的、不负责任的诽谤”^②。

事实上，令皮卡尔更不能接受的是巴特的著作《论拉辛》。1963年巴特将自己关于17世纪悲剧作家拉辛的三篇文章《拉辛人》、《说拉辛》和《历史还是文学》合为一书，以《论拉辛》为题出版。巴特在这本书中采用了精神分析学、社会学、语言学等方法来剖析拉辛的作品，并用符号学系统加以归纳。在巴特看来，这些互不相同的批评语言“没有一种是中性的，然而，承认不可能谈论关于拉辛的‘真理’，正是最终承认了文学的特殊性质。这种特殊性存在于一种悖论之中：文学是一种物品、规律、技巧和成果的总合，它在当今社会的总体经济中的作用恰好在于使主观性制度化。要跟上这一趋势，批评家就应该使自己成为悖论，公开表明这场让他以某一种方式而不是以某种另外的方式谈论拉辛的必然的赌博，因为他本人就属于文学的一部分。这里的第一条客观规则就是宣布不存在中性的阅读方式。”^③由此，巴特揭示出拉辛戏剧的本质：“拉辛的戏剧不是爱的戏剧，而是暴力的戏剧；不是道德的戏剧，而是情欲的戏剧；不是充满着澄明的一片和谐，而是神秘的黑暗与惨淡的光明的伟大斗争。”^④此外，1960年巴特在《历史还是文学》(*Histoire ou littérature ?*)一文中讨论了其他有关拉辛的评论著作，其中也包括皮卡尔的博士论文《拉辛生平》。巴特认为这些批评过分依赖历史考据，热衷于作者的个人活动，而忽略了文本本身的意义，使文学批评变成了个人传记。

作为当时研究拉辛的专家，皮卡尔当然无法接受这样的指责，于是这场法国批评史上新旧两派的论战愈演愈烈。1965年，皮卡尔针对巴特的理论发表了一本小册子《新批评还是新骗术？》(*Nouvelle critique ou nouvelle imposture*)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他指责这种所谓的多元阐释理论是对古典悲剧作家拉辛的一种亵渎，冒犯了实证主义批评的权威以及学院派的学术权威。他认为巴特所谓的科学性、严格性不过是通过一些晦涩的术语故弄玄虚，巴特对拉辛的论述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毫无根据的。皮卡尔在文中一再声称学院派通过耐心的研究确实发现了关于拉辛的真理，他尤其强调语言的确定性、心理连贯性的含义以及风格的结构要求为研究提供了不可辩驳的事实，从而确保了对拉辛作品进行阐释的客观

^① 同上。

^② 同上。

^③ 罗兰·巴特：《论拉辛》，巴黎：瑟伊出版社，1963，第156页，转引自黄晞耘，《罗兰·巴特思想的转捩点》，载《世界哲学》，2004年第1期，第33页。

^④ 胡经之、王岳川、李衍柱等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一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531页。

性。

皮卡尔完全拒绝承认语言的不确定性以及语言的象征意义，他认为如果批评家可以任意地、完全凭主观地去对待作品，那么最终会完全背离作者的原意，导致一种相对主义。皮卡尔在这本册子中的激烈言辞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使这场论战趋于白热化，而巴特也因此成为了新批评的代言人，被推到了风尖浪口。1966年，巴特针对皮卡尔的抨击发表了《批评与真实》一书。全书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巴特首先针对学院派所宣称的批评的拟真性进行了驳斥。他认为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艺术就和拟真性联系在了一起，而事实上，拟真并不就等于历史或者科学。“批评的拟真喜爱很多的‘事实’，可是这些‘事实’特别具有规范性，”^①只要是超出了这个规范性的范围，就被认为是反常的或无法令人接受的。随后巴特又对拟真性的具体条规（客观性、品味和明晰性）逐一进行了分析。学院派认为批评的客观性是建立在“语言的确定性、心理连贯性的含义和风格的结构要求”上，而在巴特看来这几点只是辞典学、心理学和文体学的结合，缺乏具体的标准。此外，语言作为符号体系，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象征性的本质，所以巴特对于把批评只限于作品字面意义上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问题是人们有没有权利在字面意义之外，读到其他与本义无违的其他意义，这不是辞典所能回答的问题，是要在语言的象征本质上下方的总体判定。”(Barthes, 1966: 11)巴特还提出“所有批评的客观性并不是依赖准则的选择，而是看它所选择的模式是如何严格地运用到分析上去。”(Barthes, 1966: 11)至于批评的品味，巴特认为学院派把所有无法归到科学中的一切价值都纳入了品味之中，品味拒绝谈论客体，即实物，其唯一的对象只是单一的价值，而这正与新批评相反，新批评十分注重对实物的探讨。因此，尽管旧批评一再标榜其科学性，但是事实上它只是一种抽象的、对意识形态的批评。关于明晰性，巴特认为明晰性只是建立在接受者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的，这是一种语言的禁令，他指责旧批评“虔诚地保存已故作家的语言，同时也拒绝思想界的新词、新义”(Barthes, 1966: 21)。在第二部分中，巴特并未继续针对皮卡尔的抨击做出回应，而是就文学与批评，批评与阅读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些讨论，提出了以语言学类型作为文学科学的基本模式。他认为“批评并非科学；科学是探索意义的，批评则是产生意义的”(Barthes, 1966: 62)，抛开了作者意图后的文本，自然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可能。因此，批评应该与作者保持距离，并积极从作品中导出意义。

以罗兰·巴特为代表的新批评派和以雷蒙·皮卡尔为首的学院派之间的这场观念之争，在20世纪初实证主义当道的法国批评界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巴特作为新批评的代言人引领起一股批评界的新浪潮。虽然他也受到了很多指责，甚至是人身攻击，但也正因如此，使他在法国学术界名声大振，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著作，结构主义的批评观也开始逐渐为人所了解。

总结双方的主要观点，可以得出以下两个主要的对立面：单一论和多元论之争以及外部研究和内在论之争。首先，皮卡尔认为文学作品具有一种确定的，单一的真理，而这个真理正是基于语言的准确性，明晰性，文学批评的任务就在于严格遵守作者的语言来确定作品的意义。而巴特的多元论是建立在语言的不确定性上，他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强调文学语言的符号特征，把作品看作是语言的事实，“文学中的自由力量并不取决

^① 罗兰·巴特：《批评与真实》，温晋仪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8页。

于作家的儒雅风度，也不取决于他的政治承诺（因为他毕竟只是众人中的一员），甚至也不取决于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而是取决于他对语言所做的改变。”^①因此语言的象征性决定了作品意义的多元化，而批评的作用就在于发掘文本的意义，他认为在不断变化的时空纬度下，总会有新的视角出现，因此没有一种批评能够穷尽作品的意义，皮卡尔所坚持的实证主义批评当然也不能。其次，皮卡尔把文学作品看作是对外部世界的真实反映，拒绝进入作品的内部，而局限于通过社会学研究的方法，把重点放在了对作品的外部研究上，诸如作家的生平，当时的社会背景，伦理道德等等。巴特则认为作家和批评家永远不可能站在同一个位置上来看待作品，无论批评家如何深入研究作家的生平或是当时的社会环境，都不可能真正回到作品产生的那一刻，因此任何人都不能声称自己发现了作品的唯一的真理，最多只是众多可能的真理中的一个而已。因此批评家应该毫不犹豫地探究作者的意图中走出来，不应该求助于作品的外部世界，而是应该把注意力转到文本上，把作品当作一个符号系统来看待，巴特注重的是作品的内部研究，通过各个功能层之间的关系，探讨作品的内在结构。

以上两点涉及到的是一个批评的方法论问题。此外，他们两者之间最深层次的分歧体现在两种不同美学观的冲突。作为 19 世纪末以来一个主要的美学形式，实证主义美学一直都奉行泰纳在其著作《艺术哲学》中所倡导的理论，即“种族、环境和时代”之说，艺术要表现事物的主要特征等，虽然泰纳的学说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自然科学大获其胜的背景下而导致的一种拜物教的倾向，自诩继承了良好文学传统的学院派正是以实证主义作为其主要的理论基础，认为“种族、环境和时代”这三个要素是决定作品意义的关键所在，因此，为了寻求作品的唯一真理，文学批评也应该围绕这三个因素展开，这不仅限制了批评的领域，也忽略了批评的真正对象：文本，即作品话语本身。

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进入到 20 世纪中叶，各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层出不穷，如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现象学及形式主义等等。巴特美学思想的核心毫无疑问是结构主义，这也是 20 世纪最主要的思潮。主体的消解是这个世纪哲学领域里最重要的一个特征，而反映在文学批评中，也就是批评的重心从作家向作品转移。从巴特的第一部著作《零度写作》开始，他就一直以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为理论基础，致力于把语言学的结构分析模式推广到各个领域。巴特认为语言不再是文学的一个表达媒介，语言就是文学的中心问题。因此，文学并不是对外部世界的模仿，而是一种自足的符号系统，批评的任务就应该是关注这个符号系统本身。实证主义把文学看作是符号活动之外的东西，这样必然会消减文学的独立性。

虽然巴特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不少人觉得他的理论显得不够严谨，甚至前后自相矛盾。尽管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被认为是把作品置于“语言的囚笼”之中，但是巴特在当时提出的新批评理论的观点，开拓了人们的视野，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也为文学批评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而他敢于对当时所谓的正统批评产生质疑的科学态度更是与他的对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相比之下，学院派固守自己的文学传统，这种拒绝新理论不思进取的

^① 罗兰·巴特：《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演讲》，载《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第 4 页。

做法也注定了其在这场论战中的失败。

站在今天的历史角度回顾这场发生在上世纪 60 年代的论战,不难看出无论是巴特还是皮卡尔,他们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巴特和皮卡尔两人分别代表了两个极端。对于批评而言,文本和语境是密不可分的两个部分,对其中任何一项的忽略都会导致批评的片面性。即使在今天,如何正确看待作家、作品以及批评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暂且撇开双方争论的内容,这场论战仍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正是巴特对拉辛作品的重新解读触犯了皮卡尔在这一领域内的权威,而由此引发了两派之间的争论。这种权威实质上是一种话语霸权,皮卡尔对巴特的全盘否定就是在宣称只有他的评论才是对拉辛作品最客观,最符合作品原意的解读。而作品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作品的意义就成了批评家们所寻求的终极目的。在这个寻找作品意义的过程中,各式各样的批评理论就此应运而生。然而,批评家是否真的拥有对作品阐释的绝对权利和自由呢?直到今天都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尽管如此,巴特和皮卡尔对于拉辛作品的探讨,无论其内容还是形式都不会丝毫有损这位古典主义悲剧大师的历史地位。而且正是因为这场论战才使得拉辛的作品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焕发出了别样的光芒。经典作品永远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就失去了光彩,而作为一个批评家更有责任不让前人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在时代的更替中被淡忘。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亘)